

佛教文化與現代社會

陆嘉玉 || 主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

陆嘉玉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任继愈 汤一介 编著—天津;

主编 陆嘉玉 副主编 姚秉彦

ISBN7-201-03790-0

I.佛… II.①任…②汤… III.佛教-宗教文化-关系-社会-研究-文集 IV.
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0417 号

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

陆嘉玉主编 姚秉彦副主编

责任编辑 藏策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300020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16 千字 12.75 印张

2002 年 10 月第一版 200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31 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序

季羨林^①

佛教入华,垂两千年。面对中国各方面之影响,既深且远。这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事实,用不着再详细阐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举凡宗教、哲学、政治、经济、语言、绘画、雕塑、音乐、建筑、天文、地理,以及科学、技术等等,无不或多或少地,或明或暗地,受到印度的影响,直至今天,流风尚存。试问如果没有印度的影响,今天我们中国的文化、思想、宗教、习俗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中华,得天独厚,名山胜水,遍布全国。试问:如果没有佛教寺庙的琳宫梵宇、层阁宝塔,今天我们中国的山山水水、通都大邑、穷乡僻壤的绚丽风光,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仅此两问,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和意义之大,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但是,佛教作为一个异域的宗教,进入中国以后,走的也不永远是一条平坦的阳关大道。外来文化传播的规律和阶段一般都是进入、碰撞、适应、融合。这四个阶段,佛教也都一一走过。碰撞阶段,历时甚久,有时也非常残酷。三武灭佛,固无论矣。一大帮天子文人,有的信佛,迷信到舍身的程度,有的就不但不信,而且加以排斥。坑坑坎坎,弯弯曲曲,时而山重水复,时而柳暗花明,佛教一直在中国走了两千年,直到五六十年代,还运交华盖,一位深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家、老史学家,在他所著的《中国通史》中还对佛教肆口漫骂。他深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之影响,忘记了一个学者的风度。至于他内心深处究竟是怎样想的,我殊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姑且存而不论。

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连我研究了一辈子的佛教也不例外。但是,我认为,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民族和人民创造出来的。

^①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

不是神造人,而是人造神。但是,宗教和神,一旦被创造出来,就被创造者所虔诚崇奉,完全忘记了他们是出自自己手下的产品。不过,有一点大家必须承认,世界上所有堂堂正正的宗教,不管它们所崇奉的最高神灵叫什么名字,也不管它们的教义如何,它们总是告诚信徒要趋善避恶,只能做好事,不许做坏事。至于奥姆真理教、太阳神殿派等等,只能算是邪魔外道,决不是一个真正的宗教。真正的宗教,只要政策对头,运用得当,会有助于安定团结,减少社会麻烦的。世界上,民族林立,芸芸众生,并不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需要宗教。只能认为宗教信仰是个人行为,各行其是,互相尊重而已,此外别无他法。至于想人为地消灭宗教,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只要人类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宗教就有存在的余地 and 价值。但是,人类什么时候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时至现代,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又成了热门话题。这一次在北京召开的“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一个证明。我自己没有能参加,深感遗憾。但是,当我看了收在本集中的文章,又深感敬佩。文章作者多属著名的学者专家,涉及面又极广,可以想见会上讨论之深入,之广博。将来全书出版后,我一定会逐篇一一拜读的。

但是,我现在想斗胆提出一个问题,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假定。不管学者们的讨论多么深入,涉及面多么广博,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现在全世界人人都关注的环保问题,都涉及到了。但是,我想,决不会有人提出佛教哲学对当前最新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能产生什么直接影响这样的问题。佛教诞生于公元前五六世纪,来华也已有两千年了,不管它的哲学多么深奥,多么邃密,可是与现代最新的前沿科学技术是难以搭界的。我个人就有这种想法。论“想法”都有点过了头,在我的潜意识中,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想,别人大概也差不多吧。

可是,我最近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计算机技术的一大贡献”。副标题是“访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唐稚松院士”。文章中有一段话:“一向重视 XYZ 系统哲学背景的

日本软件工程协会主席岸田孝一先生,在《朝日新闻》(夕刊)上发表了一篇介绍 XYZ 的文章,较中肯地说出了其中的奥秘:尽管系统所采用的数学理论来源于西方,但构造此系统的基本思想却是孔子的中庸哲学和佛教禅宗的认识论哲学,这是东方文明对于 21 世纪高新技术发展的一大贡献。”(《光明日报》1999 年 1 月 27 日)我还没有去查阅《朝日新闻》,我所读到的就只是这样简短的几句话。

我对于高新科学技术所知甚少。但是我的感触却是极多极多。这一件事情至少告诉了我们,我们应当深入、深入、再深入地研究佛教哲学以及儒家等东方文化,而且一定要结合高新科技的发展来研究。这对于我们研究佛教的专家学者们,无疑是一个新的启示、新的推动。我们的研究大有可为,前途灿烂辉煌。

目 录

论中国古代儒教即国教·····	任继愈(1)
文化的双向选择	
——印度佛教输入中国的考察·····	汤一介(6)

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

中国佛教伦理及其现代意义·····	方立天(13)
中国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人生·····	洪修平(21)
中国佛教精神文明与当代社会·····	罗 炽(30)
佛教中国化还是佛教化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之际的回顾与反思·····	
·····	聂 清 曾传辉(43)
从“班禅转世”看传统伦理道德在	
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王 尧(49)
佛教的“六度”与现代人的品行修养·····	陈 楠(56)

佛教文化与自然保护区

东洋自然观的再认识	
——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	镰田茂雄(71)
重新思考“自然”概念	
——西田哲学·····	广泽隆之(77)
再有几个地球便如何?	
——佛教文化与环境保护·····	方广钊(83)

佛教人物考稽

- 论安世高及其所传学说的性质 王邦维(89)
慧能与一行三昧 游祥洲(99)

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 东南亚的“天王传统”与后赵时代的“天王传统” 古正美(106)
中国黄檗禅与日本黄檗宗 刘泽亮(145)
唐代五台山佛教对日本佛教宗派的
 影响 周新玉 黄杰(155)
藏传佛教在俄国 李明滨(163)
中国佛教对越南佛教影响的
 一些问题 阮善志(174)

佛教文化与现代教育

- 佛教的学术研究与大学教育 姚卫群(177)
佛光山教育事业现代化的
 特色及其影响 李木妙 张华氏(186)

佛教与传统文化

- 汉代统治者的意向与儒、道、释三教的关系 郭伟川(218)
当代中国内地佛寺楹联窥斑 白化文(224)
佛教医药学术体系析研 李良松 孙婷(234)
佛教文化与文化佛教 李书有 笄善才(245)
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演进 黄河涛(252)
越南佛教与越南佛教文学之一览 释清觉(262)
二十世纪的中国佛学研究 黄夏年(268)
《中国禅宗通史》的方法论研讨 杜保瑞(286)
宝静法师的佛教现代化思想
 ——从宁波观宗寺《弘法社刊》谈起 方祖猷(329)

法门寺佛教文化考古

法门寺唐代地宫捧真身菩萨

曼荼罗之研究 吴立民 韩金科(335)

“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

研讨会纪实 黄夏年(356)

中国佛教二千年年表 于 光(364)

后记 编 者(398)

论中国古代儒教即国教

任继愈^①

南北朝以来儒教与佛、道二教并称为三教。这三教都具有辅助王化、整齐民心的社会功能,都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远在春秋以前,中国早有自己的传统宗教信仰,尚未有固定的名称。儒教的名称是后起的。

中华民族自从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活动之日起,就产生了自己的宗教。这种宗教以部落神、氏族英雄人物为崇拜对象。相传黄帝是发明舟车、宫室、衣服等器物制造的神,还创制了文字。炎帝、神农发明种植、医药,伏羲发明家畜驯化,燧人氏发明用火,他们是人,也是神。中国古代民族信仰,往往是氏族领袖,死后为神,受到本族祀奉,带有氏族、宗族的印记,还有乡土气息,与西欧古代神话传说不大相同。

中国古代的祭祀对象,祖先祭祀与天帝信奉相伴相随,纠结在一起。随着地上王国的组织形式日趋完备,上帝的轮廓、形象如影随形,也日趋完整。祭祖先,敬天神,二者紧密纠结胶固,凝为一体,构成中华民族传统信仰的核心,可以归纳为“敬天、法祖”。

中华民族活动生息的基本地区以长江、黄河流域为基地。由于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有时向外扩张一些,有时向内收缩一些,但总的范围不出长江、黄河两大流域。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栖息的根据地。

秦汉以后,以长江、黄河流域两大地区为中心,组成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这种大国统一的格局保持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由于社会的变革,文化的发展,国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大国的政体、组织形式、领导集团有过多次改变。秦汉以

① 本文作者:北京图书馆馆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来,这个多民族共同组建的统一大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几千年间,它遭受到内忧外患,政权多次更迭,社会经过无数动荡,民族之间以融会协调为基调,也有过暂时的战争。总之,秦汉以后的中国二千年的经历极不平凡。因为,人民已习惯于在中央高度统一的政权下生活。因为统一大国可以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比如说,国家统一,消灭了内战,老百姓可以百年不见兵戈,安居乐业地过日子。统一大国,可以借国家的力量赈济各种自然灾害,调剂各地岁收丰歉,从而避免人民流离失所。国家统一可以调动全国人力抵御外来侵略势力。国家统一可以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物质建设及文化建设,如修长城,开运河,整治大河河道,修纂大的文化典籍,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远非一城一地的人才所胜任,要集中全国人才,协同攻关,才能产生第一流的成果。

同时还要看到,古代中国是个自然经济结构的小农经济,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生产的产品除了供全家消费,所余无几。正是借助统一大国的高度集中,把分散、零星的少量财富集中起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充分发挥大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办成几件大事。历史上大国统一也给人民带来了某些不便,但几千年的实践表明,广大人民对统一大国的格局是拥护的,支持的,并在思想观念上取得共识,广大人民一直认为统一大国是正常的,分裂、割据是不正常的。即使在某一阶段处在南北分裂时期,割据者也认为应当统一,要求结束不正常的局面。

从秦汉到鸦片战争,中国历代王朝都努力加强有效的大一统的政治管理,努力建立完善、合理的社会秩序。他们除调动政治、法律的强力工具外,还要发挥哲学、宗教的教化作用,配合政治,以补充刑罚的不足。只有法治与教化两者相辅相成,才可巩固、完善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大国。

儒教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了几千年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在秦汉以前,已经提出“敬天、法祖”的信仰核心。秦汉以后,国家形式日趋完备,天帝的形象正是地上王国的神光曲折的反射。天神除了司祸福、赏罚,还要监察、规范人们的内心活动、行为动机。佛教、道

教、儒教都从不同的角度,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制度的合法化、合理化构建理论体系。

中国人民接受、支持、维护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佛、道、儒三教分别从自己的宗教立场论证其合理性。从“三纲”、“五常”的言行中体现天理。宣扬忠孝是出自人类天性。不忠、不孝是违背人的天性,不但不能成佛、成仙、成圣贤,甚至也不足以为人。

儒教在古代曾有过功劳,因为它为巩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起过积极作用。古代封建大一统的成就已经证明这一制度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需要。为这个制度服务的儒教的功绩要给予足够的肯定。

中国传统宗教的核心信仰是“敬天、法祖”,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宗教核心信仰是“忠孝”、“三纲”。“忠孝”、“三纲”的信仰与“敬天、法祖”的古代信仰一脉相承,只是把敬天法祖的宗教内容加以完善化,它是宗教信仰,又是政治思想,更能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

先秦敬天法祖的信仰,与当时中央政权的统治不太集中、中央统摄力远不够强大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秦汉以后,地上王国势力强大了,上帝的统摄范围也扩大了,不但山川、日月,连人们的内心活动、一念善恶也要受宗教神学的管束。

秦汉以来,由皇帝直接管理天下的郡县,参与管理的有丞相、三公。但皇帝经常受到大臣、权臣的干扰,甚至发生宫廷政变,皇权有时遭到篡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社会秩序,宋朝以后,加强了儒教的教化作用。宋以后,有权臣而没有篡臣,儒教以教化力量巩固了中央集权,使它更趋稳定。曹操在唐以前有能臣的形象,宋以后,曹操成为奸臣。唐以前,杨雄在思想界有较好的声望,宋以后,由于杨雄作过王莽的官,声望下降,特别是明清两代,以科举取士,官方用考试制度加力推行儒教思想,以宋儒程朱思想体系作为取士的准绳,等于用行政命令强化普及儒教信仰。科举考试是明清两代读书人仕进的必由之路,凡是走这条路的士人都要系统地接受儒教思想的培训,这对儒教的普及起了有力的作用。

中国的儒教还有另外的特点,即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不分,政

教一体。皇帝兼任教皇,或称教皇兼皇帝。神权、政权融为一体。儒教的教义得以政府政令的方式下达。朝廷的“圣谕广训”是圣旨,等同于教皇的敕书。中世纪欧洲的国王即位,要教皇加冕,才算取得上帝的认可。中国的皇帝即位,只要自己向天下发布诏书就行了。诏书开首必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始,皇帝的诏书同时具有教皇敕令的权威。

儒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宗教,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民族,包括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如北方的辽、金、元,西夏及清,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孔子为教主(这是孔子生前没有料到的,正如老子被道教奉为教主没有被老子料到一样)。

儒、佛、道三教同为古代传统宗教。惟有儒教利用政教结合优势得以成为国教,儒教的神权与皇权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一旦皇权制度被废除,儒教也随着皇权制度一同凋谢。行政命令打不倒宗教,早为历史所证明但政权是可以更迭的。儒教与皇权融为一体所以才会随着皇权的废除而消亡,佛、道还能继续存在。可见,宗教存在有其长期性。儒教中“敬天法祖”的宗教核心部分,今天还在中国人思想中有影响,而“三纲”思想今天存在的地盘大大缩小,消失殆尽。

按儒教发展进程,大致可以分作以下几个阶段:

- 一、前儒教时期——秦汉以前;
- 二、准儒教时期——两汉;
- 三、三教并立时期——魏晋、隋唐;
- 四、儒教形成时期——北宋(张、程);
- 五、儒教完成时期——南宋(朱熹);
- 六、儒教凝固时期——明清。

为了研究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必须打开儒教这堵墙。这堵墙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挡住了我们的视野。

我们正面临开放的新时代,中华民族正满怀信心地走向世界,我们有吸收外来有价值的文化充实自己的优良传统,又有固步自封的保守习惯。民族文化瑰宝粘附着污垢。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大厦,先要清理好我们古老的地基。我们长期封闭,一旦接触到先后涌进

的五光十色的外来文化,难免应接不暇。对中国自己的古老文化,也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审慎评估。“五四”以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地研究,惟独对影响中华民族的伦理观、价值观、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家庭生活的儒教,没有认真清理,以致有许多本来可以找到说明的道理,却看不明白,说不清楚。不研究儒教,就无法正确认识古代和当前的中国社会。

思想体系是一个民族全部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的一面镜子。儒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道教没有成为国教。道教影响也很深远,但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即使在它极盛的时期,势力远不及佛教,更不能与宋明以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儒教相比。只有摸透儒教的存在这个事实,进而充分研究儒教的许多分支部门,才能有效地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增添一些建筑材料。

文化的双向选择

——印度佛教输入中国的考察

汤一介^①

一种外来文化传到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中,往往一方面需要适应原有文化的某些要求而有所变形;另一方面也会使原有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刺激而发生变化。因此,在两种不同传统的文化相遇过程中,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这种文化的双向选择,对于有较长历史较高水平独立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也许表现得更为明显。

从中国历史上看,外来文化的传入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公元1世纪前后开始传入的印度佛教,另一次是16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输入。本文想就印度佛教的传入来讨论两种不同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调和,以说明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的选择和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变化。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大体经过如下的过程:

(一)由西汉末至东晋,印度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时首先依附于汉代的方术(又称“道术”),到魏晋又依附于魏晋玄学。在汉朝,佛教所讲的内容大体上是“神不灭”(精灵不灭)和“因果报应”等,袁宏《后汉记》中说:佛教“又以人死精神不死,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而这些在中国原来就有类似的思想。如各种各样的“有鬼论”和“神不灭”思想,在《淮南子·精神训》中说:“形有摩而神未尝

①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化”，形体可以消失，而精神仍然可以存在。而在王充《论衡》中曾批评“世谓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的“有鬼论”。至于“因果报应”，佛教与中国本土原有的说法不尽相同，但汉时佛教所传播的“因果报应”思想实在与中国原有的“福善祸淫”相贯通。如《易·坤卦·文言》中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大为流行。玄学讨论的般若学传入中国，般若学所讨论的“空”和“有”的关系问题与玄学比较接近。到东晋，般若学分成若干派，而他们往往用所谓“格义”或“连类”的方法来解释佛教思想。所谓“格义”就是观念的比配用中国的观念比配印度的观念；所谓“连类”也就是用佛教比附老庄思想。这都是用中国思想来解释印度佛教。例如当时般若学“六家七宗”宗中的“本无义”实是王弼、何晏“贵无”思想在佛教般若学中的表现；“必无义”则多与嵇康、阮籍的“无心”思想相接近；而“即色义”又与郭象的“崇有”思想不无关系。到东晋末，有僧肇据佛教般若学批评了“心无”、“本无”、“即色”三家，虽然是批评东晋般若学各派，同时也是批评玄学各个流派。不过在僧肇的著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所讨论的问题也还是玄学问题，所用名词概念也多为玄学家原来所使用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僧肇的思想看成是魏晋玄学的终结和中国佛学的开始。

从这一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种文化都会有其保守的一面，对外来文化总有某种抗拒性。因此外来文化首先往往要适应原有文化的某些要求，依附于原有文化，其中与原有文化相近的部分比较容易传播，然后不同的部分逐渐渗透到原有文化中起作用，而对原有文化发生影响。

（二）印度佛教在东晋后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的印度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并在矛盾冲突中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东晋之末、刘宋之初，佛教大小乘各派学说均有输入，佛经翻译日多，从而兴起了对佛教经典的各种解释，进而有所谓经师讲论的兴起。这就帮助了僧人对佛教各派理论有较深入的了解。但印度文化与中国原有文化毕竟是两种不同传统的文化，它不可能永远依附于

原有文化,所以到东晋以后由于佛经翻译多起来,而且越来越系统和准确,并且可以看出它的理论在某些方面有胜过中国传统文化之处,因而在两种不同传统的文化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和冲突。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中国原有文化的冲突表现在各个方面,有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也有哲学和宗教伦理方面的问题。从现存的一部著作《弘明集》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两种文化矛盾冲突的若干问题:有关于“沙门应否向帝王致敬”的问题,这涉及“出世”和“入世”、“忠君”、“孝父母”等等问题;有关于“神灭与神不灭”问题的争论;有关于“因果报应有无”问题的争论,它涉及“因果”和“自然”(性命自然)这样的哲学问题;有关于“人和众生”问题的争论,何承天根据《周易》认为“人”与“天”、“地”并列为“三才”,批驳佛教把“人”与“众生”同列,这自然和维护儒家传统有关;还有所谓“夷夏之争”,何承天的《答宗炳》谓“华戎自有不同”,在于其性,“中国之人,禀气清和,含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之教;外国之徒,受性刚强,贪欲忿戾,故释氏严五戒之科”。道士顾欢著《夷夏论》谓,华夏为礼仪之邦,故不当舍华效夷。这一时期还发生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事件。但有一点似可注意,即帝王企图用政治力量来消灭佛教,都不成功,相反当情况一变,佛教就有更大的发展。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两种不同传统的文化在接触一段时间之后必然要发生矛盾与冲突,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是用政治力量来排斥外来文化,还是在两种不同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中善于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这是大问题。从总体上说,由于在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采取了欢迎的态度,从而能在矛盾冲突中不断吸收印度文化,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无论在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建筑雕刻,还是在科学技术以至医药卫生方面都有表现出生气勃勃的姿态。

(三)印度文化到隋唐以后逐渐为中国文化所吸收,首先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到宋朝以后佛教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融合于中国文化之中,形成了宋明理学,即新儒家学说。

隋唐时期可以说是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中国出现了若干极